

仍是現實主義的傳統： 九一一與布希主義

吳玉山*

摘 要

九一一的恐怖攻擊行動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產生了很大的衝擊。自從冷戰後期以來，原本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執牛耳的現實主義典範便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抨擊。冷戰結束後，更有建構主義的興起，也是以現實主義為敵。而九一一似乎顯示著杭廷頓文明衝突論的正確性。連續受到這麼多理論的衝擊，現實主義是否仍然能夠提供現存國際關係的有效解釋？這個問題構成了本文的主要關切。在文中我們探索了九一一攻擊行動的根源、現實主義受到的衝擊，和國際體系對於九一一的反應。在國際體系反應的這一部份，又包括美國的布希主義和各國對於布希主義的反應。我們發現九一一的根源是反現代化的伊斯蘭激進主義，因此對於恐怖主義的攻擊者而言，這是文明衝突。然而就國際體系的反應而言，不論是布希主義的戰略思惟、操作方式、或是影響成果，還是各國對於布希主義的反應，都是依循著現實主義的理路。因此就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而言，九一一實質上凸顯了現實主義的有效性。

關鍵詞：九一一、布希主義、現實主義、美國外交政策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伊斯蘭激進份子對於美國政治、軍事和經濟中心展開了恐怖主義的攻擊¹。這對於以現實主義為主軸的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產生了重大的衝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

¹ 發生在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二日的印尼巴厘島（Bali）爆炸案，造成了約 190 名西方人士的死亡，是繼九一一之後最大規模的國際恐怖攻擊行動。這是九一一的後續，犯行者據信也是伊斯蘭激進組織。

擊。一時間，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甚囂塵上²。如果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係是以文明衝突為主題，那麼以國家為主要行為者、以安全利益為主要行為目標的現實主義便需要重新改寫，甚至廢棄。然而，雖然文明衝突確實是存在於九一一攻擊者腦海中的圖像，國際關係的發展卻還是沿著現實主義的路徑。美國「布希主義」(the Bush Doctrine)的提出，和各國對於「布希主義」的反應，都充分驗證著現實主義對於國際關係仍然具有最大的解釋力。在九一一滿一週年之際，美國總統布希將伊拉克和國際恐怖主義與九一一攻擊事件聯繫起來，建構出波灣戰爭結束十一年後對巴格達重新動武的正當性，此一動作本身更是現實主義的有力佐證(Bush, 2002a)。在本文當中，將討論九一一事件的根源、九一一對於國際關係理論典範的衝擊、布希主義的意義、各國對於布希主義的反應，和現實主義在詮釋國際關係上的有效性。由於九一一的後續效應仍然在持續產生作用，美國的「反恐戰爭」也已經從阿富汗階段進入了伊拉克階段，本文勢必無法全面包括、逐日增補，因此以下的分析重點是置於九一一的發生和美國與各國在反恐戰爭第一階段(阿富汗戰爭)的反應。關於第二階段(伊拉克戰爭)的發展，只有在和上述分析直接相關之處才會提及³。又由於本文主要是處理在重大國際事件後國際體系是否轉型、現實主義典範是否能具有適用性等議題(也就是在體系層次)，而不是追尋現實主義的國內政治根源，因此將不會處理布希總統的個人特質或是美國國內政治等部分。

壹、九一一的根源

九一一所反映的是反現代化的激進勢力(anti-modernization radicalism)對於西方世界標誌的攻擊。反現代化的激進力量始終存在，在二十世紀，這是除了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現代化威權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外的第四種普世現象(Wu, 2000: 229-264)。現代化威權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和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為敵的，但是它們所代表的是走向現代化(工業化、都市化、科技化)的另類途徑⁴。也就是說，民主資本主義、現代化威權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追求現代化的。反現代化的政治運動

² 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首先出現在一九九三年夏季號的 *Foreign Affairs* 中。三年後杭廷頓又出書詳述了他對於「文明衝突論」的看法。參見 Samuel P. Huntington (1993: 22-49; 1996)。

³ 在以下的討論當中將提出在反恐戰爭伊拉克階段的初期，布希現實主義的特色表現地比在阿富汗階段當中更為強勁。然而由於在本文寫作時，伊拉克階段才正在展開，因此無法完整地納入本文的討論與分析範疇。

⁴ 因此葛申克朗(Alexander Gerschenkron)便將英國式、法國式、德國式和蘇聯式的工業化途徑放在一個向度上來理解。他認為由於國際競爭的關係，越落後的國家便要訴諸越強力的累積資本的方式，因而必須採取更威權的政治形式。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政權都是在這個情況下產生的，它們都是達到快速現代化的手段。參見 Alexander Gerschenkron (1962: 5-30)。

卻與上述三者都不相同，除了在最表面的武器層次之外，它對於現代化是採取斷然拒絕的態度。反現代化激進主義在過去曾表現在高棉波布政權的屠滅城市運動、祕魯毛派「光明之路」（Sendero Luminoso）的恐怖主義、伊朗何梅尼的回教革命，和阿富汗塔里班「神學士」政權對現代文明的反動等。九一一主嫌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的勢力在阿富汗找到棲息之處正是由於賓拉登和神學士政權間意識形態上的相合之處。不像現代化威權主義、或是共產主義，反現代化運動並不要藉著經濟和軍事力量的發展來和西方爭雄，因為那樣做會迫使他們接受現代化所要求的城市化、工業化、非宗教化等。反現代化者要求激烈地回到傳統的信仰、或是歷史的神話。他們無法建立真正強大的力量，但是卻有強烈的使命感，和巨大的破壞力。

當全球在經濟上都已經轉向西方資本主義，並且在政治上也相當程度地產生了政治自由化壓力的時候，反現代化的運動受到刺激而接踵出現。就賓拉登而言，他所反對的不僅是美國幫助以色列、壓制巴勒斯坦建國運動，而是現代化與西方化正在摧毀伊斯蘭的宗教世界，構成了俗世化的威脅。賓拉登是回教瓦哈比教派（Wahhabism）的虔信者，這是十八世紀在阿拉伯半島興起的宗教復興運動，要求回復想像中初期伊斯蘭的純粹原始形態。瓦哈比教派是遜尼回教（Sunni Muslim）中的清教徒，強調苦行、禁慾，恪遵可蘭經的教義⁵。比起其他的回教教派，瓦哈比教派較為排外和不寬容，並且具有較強的侵略性。這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國教，由政府每年撥出大筆經費向全世界傳布（Garfinkle, 2001）。此種擴張性的宗教主張和沙烏地王室達成了一種默契：王室支持沙烏地富裕家族資助極端宗教力量向世界各地傳布瓦哈比教派的教義，而宗教勢力則承諾不在沙烏地本國興起事端⁶。賓拉登便是在此種背景下出走沙烏地阿拉伯，在海外成立「基地」（al Qaeda）組織，並成為具有類似信仰的阿富汗神學士政權的國賓⁷。

作為瓦哈比教派的虔信者，賓拉登對於現代化和西方產生了極大的反感。賓拉登認為美國長期以來夥同以色列對全世界的回教徒作戰，而美國為了對付伊拉克在

⁵ 遜尼回教共有四大教法學派：罕百里教法學派（Hanbali）、沙斐儀教法學派（Shafi'i）、馬立克教法學派（Maliki）與哈乃斐教法學派（Hanafi）。以沙烏地阿拉伯而言，罕百里派佔居民總數的一半左右，沙斐儀派佔 37% 以上，馬立克派約有 3%，而人數最少的是哈乃斐派，約佔人口總數 1.5%，他們大部分是土耳其人的後裔。瓦哈比教派便是罕百里學派的一支。該派於十八世紀三十年代產生於阿拉伯半島，創始者為內志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勒·瓦哈布（Muhammad ibn Abdul Wahhab, 1703-1792）。瓦哈比派自稱為「一神論者」，主張恢復伊斯蘭教初期的本來精神，否認人與阿拉之間存有中介，反對崇拜「聖徒」、「聖陵」和脫離《可蘭經》的宗教生活，故亦被稱為伊斯蘭教的清淨教派。

⁶ 瓦哈比教派和沙烏地王室早有默契。今日的沙烏地阿拉伯國家就是奠基於十八世紀時瓦哈比教派和沙烏地家族的聯盟。參見“Inside Wahhabi Islam,” *BBC News*, 30 September 2001, news.bbc.co.uk/2/hi/world/middle_east/1571144.stm。

⁷ 神學士政權是屬於 Deobandi Movement，這是源於印度喜瑪拉雅山區的另一支清教徒式的遜尼回教。

沙烏地阿拉伯駐軍，是褻瀆了伊斯蘭世界的聖地。沙烏地政府引進了美國的勢力，因此也要負責。美國駐軍必須要從巴林、阿聯和埃及撤出，對於利比亞、敘利亞、伊朗、蘇丹的制裁要停止。賓拉登希望建立一個統一的回教國家，徹底奉行回教律法（Shari'a, or Islamic law），也就是回到七到十三世紀的阿拉伯回教國家形態⁸。賓拉登在現世的理想統治者是神學士政權的歐瑪（Mullah Mohammed Omar）。這不是任何美國的政策所可以扭轉的。此種反現代化激進主義的勢力，是和現代世界為敵的。由於它未必能附麗於國家體制（例如光明之路），或在掌握國家政權之後受到國際現實的約制，而逐漸軟化（例如伊朗），因此無法構成強大的有形勢力。但是正由於它和西方國家的力量懸殊，而理念上的敵對又最為強烈，因此容易採取恐怖主義的以小搏大的、非對稱性的攻擊行為。它會不定時的攻擊，但是不會在結構上扭轉國際關係的結構，因為它的力量是有限的。

很明顯地，反現代化的激進勢力不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典範所能掌握的對象。以賓拉登為例，他所代表不是特定的國家、而是一股激進的回教勢力。他的追隨者跨越國籍，以理念相結合。他所追求的，不是世俗國家的安全利益，而是宗教的烏托邦境界。他和美國的衝突，是反現代化的激進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的衝突，也就是理念上的衝突、文明的衝突。

貳、後冷戰時期對現實主義典範的挑戰： 新自由主義與文明衝突論

在蘇聯崩解、冷戰結束後，學術界對於未來國際關係提出了不同的展望。現實主義者觀察後冷戰時期國際間各主要國家的力量對比，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美國獨霸的結論。「單極體系論」就是這種思考的反應（Kapstein and Mastanduno, 1999）。現實主義者（包括傳統和結構兩派）把國家看作主要的行為者，而以安全利益作為國家行為主要的動因⁹。因此現實主義者不認為冷戰後國際關係有任何本質的改變，不過是權力結構由兩極趨向單極罷了。然而對於新自由主義者而言，冷戰的結束加速了國際關係脫離現實主義的假設。他們認為國際間的主要行為者甚多，包括國際組織與跨國企業等，非國家所能夠壟斷。而國家目標也不是像現實主義者所說的，以安全含括一切。就權力的內容而言，經濟的因素比起軍事力量更為重要（Keohane and Nye, 2000）。對於國際合作的前景，新自由主義者比現實主義者樂

⁸ 關於賓拉登的理念，參見“Interview Osama bin Laden, May 1998,” *PBS Frontline*, 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binladen/who/interview.html。

⁹ 關於傳統現實主義的看法，參見 Hans J. Morgenthau (1967)。關於新現實主義者的看法，參見 Kenneth N. Waltz (1979)。

觀 (Keohane, 1984)。他們認為國際建制 (international regimes) 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讓理性的決策者在追求最大利益的條件下願意推動國際合作 (Krasner, 1983)。現實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之間的論爭從一九八〇到一九九〇年代持續不斷 (Keohane, 1986)。一方面美國獨霸的態勢正在形成，因而加速了現實主義解說國際關係的份量，另一方面由於全球化的趨勢在此一時期也加速進行，其中經濟整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這一部份正是新自由主義者所強調的。因此後冷戰時期究竟應該如何定性，在國際關係學界一直是一個爭議的主題 (Baldwin, 1993)。

九一一的恐怖攻擊事件改變了國際關係研究的爭辯焦點。九一一事件無疑是伊斯蘭激進份子對於美國所代表的西方現代文明的反動¹⁰。這個事件證明了杭廷頓在一九九三年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確是洞見之作。杭廷頓認為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冷戰終結時所提出自由主義將在全世界勝利的看法是錯誤的¹¹。杭廷頓大膽的預示今後人類將衝突不斷，而其主要的根源將是文化。以往國王之間的爭戰、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不同意識形態間的敵對，今後都將被七到八個主要文明系統間的歧異和紛爭所取代¹²。果如杭廷頓所述，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係將和二十世紀的大不相同，而居學術主流的現實主義也將無法確實地描述和解釋國際關係的發展。雖然杭廷頓的理論早在一九九三年便提出，並且引起極大的爭議，但是真正能夠提升其地位的卻是八年後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¹³。由於攻擊者是為了宗教的理念而採取了自殺式的恐怖攻擊行為，因此完全無法用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來解釋。參與九一一行動的恐怖主義份子是以理念相結合，他們來自二十多個國家，跨越國界、聯合行動。這顯示了政治和宗教理念散佈全球的程度，和激進團體全球行動的能力 (Jervis, 2002: 40)。由此可以看出以國家作為主要行動單位的傳統國際關係理論是嚴重不足的。杭廷頓對於世界各大文明間的對立或許

¹⁰ 依據 Jonathan Sacks 的說法，就是全球資本主義與中世紀伊斯蘭相互碰撞之後所產生的衝突。參見 Jonathan Sacks (2002)。

¹¹ 參見 Francis Fukuyama (1992)。在本書當中，福山藉由法國哲學家 Alexandre Kojève 對於黑格爾 (G.W.F. Hegel) 的闡釋，提出了民主由於能夠滿足人們對於被承認的要求，因此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歸趨。

¹² 這七到八個主要的文明系統是西方、儒家、日本、伊斯蘭、印度、斯拉夫—東正教、拉丁美洲和非洲。杭廷頓對於非洲是否構成一個文明系統表示不確定。部份論者認為後冷戰時期的文化衝突不僅限於世界各主要文明體系之間。即使在西方的內部，也出現了嚴重的分歧，產生了對於自由主義的重大挑戰。例如 William Anthony Hay 便憂慮多元文化主義會侵蝕了美國的歐洲傳統，而 John Fonte 更認為多元文化主義和由此產生的跨國進步主義會對傳統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造成極大的威脅。見 William Anthony Hay (2001) 與 John Fonte (2002)。

¹³ 關於杭廷頓和福山論述的爭議，以及杭廷頓理論對九一一事件的適用性，參見 Stanley Kurtz (2002)。杭廷頓具體地提出了恐怖份子可能進行對核心文化標誌的攻擊，最初為了抵拒蘇聯入侵而聚集在阿富汗的各國聖戰士將發展成重要的軍事力量、回教的基本教義派勢力增長將促使美俄接近，和恐怖主義與空中武力的軍事對決等預言，在九一一當中都成為事實。

過於誇張，畢竟只有反現代化的激進主義才會帶來九一一式的恐怖攻擊行爲¹⁴。然而他跳脫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框架，提示了文明和宗教衝突的嚴重性，可說是預示了九一一的發生，確實有其見地。我們可以說，九一一把文明衝突論提升到一個國際關係理論典範的地位。和先前的新自由主義一樣，文明衝突論在後冷戰時期對現實主義的主流論述提出抨擊。很明顯地，如果這兩個理論成立，現實主義必須重新改寫、或甚至必須拋棄¹⁵。

表一：後冷戰時期三種國際關係的典範

	現 實 主 義	新自由主義	文明衝突論
行爲者	國家	多種行爲者，包括 國家、跨國企業、 國際組織等	信仰集團，特別是 宗教
行爲者追求價值	單一：國防安全 / 擴張	多元：經濟與其他 多種價值	單一：信仰
價值排序	金字塔型	沒有一定排序，但 強調經濟	金字塔型
賽局性質	零和	非零和	零和
行爲者間關係與 合作可能性	基本上對抗 / 低	不定 / 不定	基本上對抗 / 低
學說地位	始終居於主流	冷戰後期－後冷戰 時期興起	杭廷頓提出，九一 一後獲得部份經驗 支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表一當中，我們看到了新自由主義和文明衝突論對於現實主義的挑戰。在九一一後的今天，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似乎最能夠掌握住造成國際關係巨大變動的根源。然而九一一究竟對於國際關係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這個問題不能只看到恐怖

¹⁴ 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認為和西方文明衝突的不僅是激進的伊斯蘭教派，而是整個伊斯蘭文明。參見 Adam Garfinkle (2001)。

¹⁵ 另外一個對於現實主義的主要批評途徑是「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由於建構主義主要是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批評，而不是實際國際關係的分析架構，因此在此處暫不予討論。關於建構主義，參見 Alexander Wendt (1992, 391-425; 1999)。

主義攻擊的根源，而必須看到國際體系對於此種攻擊的反應。如果體系的反應是依循其過去的運作規律，則九一一可以被視為一種外生的刺激，並沒有對體系造成改變。然而如果國際體系的運作規律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那麼九一一就造成了體系的轉型。國際體系對於九一一的反應可以分成兩個主要的方面，一個是美國的布希主義，一個是各國對於布希主義的反應。以下我們將分別討論這兩個主題。

參、布希主義

九一一事件發生之時，美國總統布希剛上任八個月，他的外交政策正在成形當中。很明顯地，九一一對於美國的打擊，以及全國沸騰的民意，都要求布希提出保護國家安全的對策。結果布希所提出的，是展開對恐怖主義的戰爭（war on terrorism），而這也就構成布希主義（the Bush Doctrine）戰略思維的主要標的。在標的設定之後，布希主義運用美國現有的優勢軍事、政治與經濟力量，以單邊主義的態勢，採用「非友即敵」的兩分法邏輯，強力地動員世界各國加入其反恐戰爭。由於美國在國際體系中實際上佔有獨霸的地位，因此其動員行動和在阿富汗的作戰表現地相當成功。從以下的討論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從戰略思維、操作方式或影響成果三方面來看，布希主義所反映的都是現實主義。

一、戰略思維：從反恐到國家中心主義

對恐怖主義宣戰在政治上是一個有力的說法，因為在九一一之後，美國的民眾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家園的脆弱性¹⁶，對於九一一攻擊者所採用的恐怖主義手段深痛惡絕，而對於日後此類攻擊事件是否會繼續發生更是惴惴不安（Mueller, 2002）。然而反恐戰爭是一個名詞的誤用（misnomer），因為恐怖主義是一種特定的作戰方式，理論上任何擁有基本殺傷力的政治勢力都可以運用它。美國如何對特定的作戰方式宣戰？因此事態發展的結果，美國不是對恐怖主義宣戰，而是對支助恐怖主義攻擊美國的國家宣戰¹⁷。推論到極致，是對有可能以某種方式傷害美國國土安全的

¹⁶ 在冷戰結束後，由於核子大戰的陰影逐漸消退，美國民眾一直以爲美國本土是不可能被攻擊的。美國可以在海外攻擊敵人，而不會在本國遭受敵人的攻擊。雖然過去美國的海外設施曾多次遭到恐怖份子的襲擊，例如美國在肯亞和坦桑尼亞的大使館，和停泊在亞丁港的軍艦（USS Cole），但是美國的本土是被妥善保護著的。即使在一九九三年世界貿易中心的爆炸案之後，美國民眾的本土安全感還是持續存在。然而此一本土安全的幻覺在九一一之後完全破滅。見 Harvey Sicherman (2001)。

¹⁷ 根據布希的說法，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是「文明的敵人」（the enemies of civilization）。參見 George W. Bush (2002b: ii)。

國家宣戰，同時全面性地加強國防¹⁸。從對恐怖主義的戰術手段宣戰，轉到對傷害或可能傷害美國國土的國家宣戰，我們看到布希主義終究是運行在現實主義的軌道之上（Garfinkle, 2001）。也就是，布希主義是以國家作為主要的行為者，主張以美國的國家力量來對抗敵對國家的力量。

在九一一事件中攻擊美國的是反現代化的激進伊斯蘭組織。美國鎖定賓拉登和它的蓋達組織作為追緝的對象是必然的。然而美國並不以緝捕賓拉登、摧毀蓋達為足，現實主義導引著布希去尋找支持賓拉登的國家、和任何對美國國土有可能構成安全威脅的國家。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美國已經從法律途徑轉到了戰爭途徑（Shultz, 2002; Sicherman, 2001）。這樣的思考，就是以國家安全為首位，將國家當作國際體系中的主要行為者。美國無法捉摸它理念上、或宗教上的敵人，也無法真正對付那些跨越國界、滲透各個回教地區的激進宗教組織。對美國人而言，無論本身的政策如何改變，都沒有辦法減低伊斯蘭激進分子對於美國所代表的西方現代化文明的憎惡（Jervis, 2002: 44）。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美國所知道的唯一戰略，是懲罰應為恐怖主義攻擊事件負責任的國家，並對所有可能對美國施加侵害的國家提高戒備¹⁹。所以這完全是現實主義的思維方式。因此雖然九一一攻擊者腦海中顯現的是文明衝突的圖像，但是美國的反應方式卻是依循著現實主義國家對國家的互動模式。賓拉登和他的同僚們想要打擊現代的、西方的文明，布希主義卻是攻擊對美國構成安全威脅的國家。質言之，文明衝突所帶來的是現實主義的反應，九一一的攻擊者和反應者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採用的也是完全不同的行動策略²⁰。

在反恐戰爭的第二階段當中，美國將伊拉克作為主要的打擊對象，並且動員起因為九一一而高度激昂的民意和支持總統的國會，做出了開戰的姿態和準備²¹。從

¹⁸ 這一方面包括加緊建立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很明顯地，NMD 對於九一一式的攻擊行動並沒有防禦意義，然而正由於美國對九一一的反應是全面性地提升國家安全，因此所有國防的措施都獲得了人民和國會的支持。布希總統在此獲得了「危機後的授權」。參見 Sicherman (2001)。

¹⁹ 因為完全以美國的國家安全作為最高考量，因此對於所有親美的回教國家政權都要支持，而不去顧及這些國家的政治體系和人權記錄。雖然有學者提出正是這些親美的威權政府不民主和缺乏效率的統治造成伊斯蘭激進勢力的興起，因此釜底抽薪之計應該是促進阿拉伯世界公民社會的出現和民主化，但是布希主義的作法卻是和許多此類的威權政府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以進行反恐戰爭。其中包括解除對於巴基斯坦軍事政權因為發展核子武器所施加的經濟制裁。參見 P. W. Singer (2002)。

²⁰ 從這個意義來說，建構主義有其見地，也就是國際關係的結構不是基於什麼物質的力量，而是源於共有的意念（shared ideas）。意念不同，對於國際關係的看法便南轅北轍，而產生的行為也就完全不同。九一一的攻擊者和反應者便是這樣兩種完全沒有共有意念的群體。然而在現存的國際間，反現代的宗教狂熱者和世俗國家比較起來，畢竟是絕對的弱者和少數，這就決定了國際體系對於九一一的反應，主要還是依循著現實主義的國家間互動模式。關於國際關係的結構是基於共有意念的建構主義觀點，參見 Alexander Wendt (1999: 1)。

²¹ 如以十二年前老布希總統發動海灣戰爭為例，當時他是先克服聯合國安理會中法國、蘇聯和中共

阿富汗到伊拉克，布希政府的思維模式愈見清晰。由於巴格達和賓拉登之間的關係相當薄弱，因此把反恐戰爭延伸到伊拉克是不合情理的²²。海珊（Saddam Hussein）總統所領導的伊拉克政權在整個九〇年代對於聯合國的武器視察和管制多所抵拒，並顯示出有持有生化武器、並意圖發展核子武器的傾向。這也是美、英等國所長期了解的。在波灣戰爭十一年後，突然對伊拉克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其原因也不是巴格達長期違反聯合國有關武器檢查的決議。將反恐戰爭的目標擴大延伸，從阿富汗轉移到伊拉克，最大的作用應在於利用民氣完成波灣戰爭未竟之志、將美國與西方的勢力伸展進入西亞、並掌控重要油源²³。這些的考慮只有透過現實主義國家中心與戰略安全的前提來理解。因此當反恐戰爭從阿富汗延伸到伊拉克的時候，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主導布希主義的現實主義戰略思惟。

二、操作方式：單邊主義、兩分邏輯與先制攻擊

布希政府在對外事務操作上，從一開始就表現出相當強烈的單邊主義傾向。對於國際組織和國際協定，經常保有很高的防戒之心，總認為會對美國的主權和國家利益產生損害。因此美國在鋼鐵產品和農產品的進口上採取了保護主義的措施，在國際刑事法庭（ICC）的設立與運作上堅持海外美軍的豁免，在環境保護的議題上抗拒京都議定書。美國為了發展和部署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更退出了反彈道飛彈條約（ABM）。凡此種種，都是力圖擺脫和避免拘束美國行為的國際建制，以追求單邊行為的最大自由度。此種傾向，雖然在布希的前任柯林頓政府時期就已

的猶豫與反對，而在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推動通過了安理會第六七八號決議案（二票反對；古巴與葉門，一票棄權；中共，十二票贊成），要求伊拉克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前退出科威特，並授權聯合國會員國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將伊軍逐出科威特。然後布希再以此外交上的勝利來促使美國國會於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二日辯論通過授權對伊拉克動武的決議案。小布希在十一年後意圖發動對伊拉克的攻擊，也是要尋求美國國會和聯合國的支持。不過美國兩次準備對伊拉克動武有一點明顯的不同。十一年前國外對美國用兵的支持強過美國國內，那是因為當時開戰的主要理由是伊拉克強佔了科威特，因此受到伊拉克威脅的鄰國很多。十一年後，美國國內對布希用兵的支持強過國外，而這是因為美國國民對於九一一創痛鉅深，而相反地各國本身的安全受到影響的程度相對較小。因此此次小布希是先獲得了美國國會的支持（二〇〇二年十月十日眾院通過決議，第二天參院也通過決議，授權布希用兵），而後才爭取獲得了安理會的第一四四一號決議案，以武力威脅伊拉克接受極其嚴峻的武器檢查，而美國同時保留隨時自行出兵的權利，並且做大規模的軍事集結。在兩次準備開戰的過程當中，老布希和小布希都持續地製造既成情勢，來導引安理會和美國國會的決定。也就是將國內和國外所獲得的用兵合法性相互為用，以一方的同意來促使另一方也給予同意，以排除對於美國動武的反對力量。

²² 由於伊拉克和賓拉登之間的關係實在薄弱，因此即使是美國的最堅強盟友英國在表示支持美國對伊拉克的強硬態度時，也無法將海珊和賓拉登做實質的連結。參見布萊爾首相在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所公佈的有關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檔案。參見“Blair's statement to MPs on Iraq,” *CNN.com/World*, www.cnn.com/2002/WORLD/europe/09/24/uk.blair.statement/index.html。

²³ 關於美國發動海灣戰爭的戰略性目的，參見周煦（2001：107-113）。

經出現，但是當時美國的態度仍有所節制。而在布希總統上任後，單邊主義卻一躍成爲美國外交政策的標誌（Hirsh, 2002）。在進行反恐戰爭時，布希政府雖然力求獲得國際的支持，但是當聯合國對於美國的行動意見紛歧時，布希便不斷發出強硬的警告，表示無論是否獲得聯合國的授權，美國都將採取行動。其對國際社會態度之強勢，是歷任美國總統中所罕見的²⁴。

單邊主義並不排除美國運用其影響力在現存國際組織中爭取支持。因此不論是在聯合國安理會或是亞太經合會當中，美國都大力操作，設定反恐議題，爭取國際社會對於其行爲的認可。特別是當反恐戰爭進入了第二階段（伊拉克階段）時，爲了獲取安理會給予對伊拉克動武的授權，美國費了極大的心力，與法國、俄羅斯和中共等國協商決議文的字句。由於對阿富汗動武比對伊拉克動武有較大的正當性，因此到了反恐戰爭的第二階段，美國所受到的國際反對比在第一階段爲強。然而布希主義的單邊傾向正是表現於事實上籌畫軍事動作，並以本國的民意支持，和不惜繞過安理會自行出兵的態勢來壓迫安理會通過決議，以給予美國對於伊拉克動武「更多」、而非絕對「必要」的正當性²⁵。在布希主義當中，多邊的考慮仍然存在，然而卻已經大幅降落，這是明顯的事實。

單邊主義是表示美國政府在國際上追求其國家利益時獨斷獨行。二分法的邏輯則是布希總統以「非友即敵」的方法來強迫各國表態、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在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日，布希明確地昭告世界，「如果你不支持我們，你就是支持恐怖主義份子」（“Either you are with us, or you are with the terrorists.”）。美國此種絕決的態度，只有在冷戰初期時出現過。它所顯示的，是美國作爲國際霸權的力量和決心。

布希主義在操作執行的層次所具有的第三個特色是先制攻擊。由於受到九一一攻擊事件的教訓，布希認爲保護國土安全必須在威脅尚未成形之前便展開行動，發起先制攻擊。布希辯稱這是美國國家自衛權的一部份（Bush 2001a）。從被動反應到先制攻擊是美國戰略思想上的一個極大的轉變。在過去美國的國防架構是防禦性的。在二十世紀美國參與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當戰爭在世界其他地區已經進行到相當程度、而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又已經受到重大傷害之後才決定的²⁶。在冷戰時期美

²⁴ 例如在是否對伊拉克動武的議題上，布希便清楚表明美國的行動不會被聯合國所拘束。參見“Bush's Iraq Policy Stalled in U.N.,”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2002, www.nytimes.com/aponline/national/AP-US-Iraq.html。

²⁵ 這個正當性已經由美國國會以絕大的支持授予。眾院是在十月十日以 296 票贊成、133 票反對通過了授權對伊拉克動武的決議，次日參院也以 77 票對 23 票通過了授權決議。以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參眾兩院幾乎平分席次的結構來看，國會對總統的支持表明了布希將九一一和伊拉克做議題聯結（issue linkage）的成功。

²⁶ 美國在一九一七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是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政策，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一九一四年便已經爆發。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因為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偷襲珍珠港，而中日戰爭在一九三七年爆發，歐戰在一九三九年爆發。

國參與韓戰和越戰也是當共黨陣營已經發動攻擊行動之後，美國才做出反應。由於本身是一個民主國家，又有大洋和其他的大陸區隔，因此美國對於在世界各地參戰一向態度猶豫，先制攻擊更是聞所未聞。此次由於九一一的攻擊行動粉碎了美國的本土安全感，因此布希可以要求更前進的防衛態勢，也就是在美國認知到重大的安全威脅、但是對方的攻擊行動尚未展開前，便主動出擊，以毀滅潛在敵人的威脅力量，確保本身的安全²⁷。此種先制攻擊的理論，再加上美國總統在使用武力捍衛國家上的優勢法律地位²⁸，替布希在反恐戰爭第二階段中對伊拉克的動武提供了根據²⁹。

很明顯地，單邊主義、兩分邏輯和先制攻擊的基礎是美國的巨大國家力量。因為擁有堅強的國力，因此美國可以單獨行動，不顧盟友的意見。又因為美國的國力強大，因此可以採用「非友即敵」的態度來強迫其他國家表態。更由於美國的國力優勢，因此可以在威脅尚未形成之前便採取先制攻擊的行動。綜合而言，布希主義把美國的國家安全無限上綱，主張一旦感知到威脅，便單方面地決定行動，並以「非友即敵」的方法來迫使全球所有國家支持。這樣的主張，一方面是反映了美國在遭受國土重大攻擊後的過度防禦心態，一方面更展示了美國國家力量的強大，以及對自我超強地位的認知（Bush, 2002b: i）。因此布希主義的操作方式是基於現實主義的原則，也就是以超強國力為基礎。

三、影響成果：重塑霸主地位

布希主義不但戰略思維是現實主義的，操作方式是現實主義的，它所產生的效果也是符合現實主義預期的。在蘇聯崩解、冷戰結束後，美國便已經獲得了世界獨霸的地位，具有以帝國主義塑造「世界新秩序」的國力。然而美國畢竟不是人類歷史上一般的大帝國。它雖然熱衷於輸出自己的理念和制度，但是孤芳自賞，又以大洋為屏障，常常興起獨善其身的念頭。冷戰的結束讓美國可以回顧本身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因此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第一任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主要是關切國內事務的。在整個一九九〇年代，美國並沒有積極地佈置最後一任冷戰總統老布希

²⁷ 布希總統先制攻擊的思路在二〇〇一年國情咨文中便已展現。參見 Glenn Kessler (2002)。

²⁸ 從法理的角度來看，小布希對伊拉克動武是依據憲法中賦予美國總統的統帥權、一九九六年的《反恐主義與有效死刑罰法》（The 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等國內法，再加上他將獲得的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與授權。至於一九七三年的《戰爭權力法》（War Powers Act）則始終是美國總統和國會之間權力爭執的焦點。關於美國總統海外出兵的法律根據，參見趙國材（2001：1-98）。

²⁹ 為了證明美國對伊拉克展開先制攻擊的合理性，布希總統在二〇〇二年十月七日宣稱海珊有可能在任何一天對於美國及其盟邦進行生物或化學武器的攻擊。因此對伊拉克的立即的行動是不可避免的。小布希並且將當前的狀況和四十年前的古巴飛彈危機相比。這就是先制攻擊主義的具體表現。參見 David E. Sanger (2002)。

所說的「世界新秩序」，反而是讓「全球化」來形塑全球市場和地球村。蘇聯的完結代表美國的獨霸，可是華盛頓並沒有把手中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拿來建立「美國和平」。在柯林頓總統時期，美國的幾個有限的軍事動作都是拖延再三，被盟國催促後才採取的³⁰。美國的對外干預不但缺乏主動、而且沒有總體的大戰略構思³¹。柯林頓總統基本上缺乏對外事務的興趣和能力，又反應了美國國內對於長期冷戰下戰爭威脅的厭倦，因此柯林頓在位期間美國基本上是較為節制和內斂的³²。

然而歷史的偶然，又使得柯林頓時期美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而美國的潛在競爭者卻瞠乎在後。在八〇年代美國受到日本經濟的威脅，充滿了恐慌的心理（Johnson, 1982; Vogel, 1979）。曾幾何時，日本早已經因為長期的經濟停滯而喪失了挑戰美國的能力。歐洲曾試圖用整合的方法來抗衡美國³³，但是目前仍然是一群彼此意志不同，連本洲的難題都需要靠美國解決的中型國家。俄羅斯在蘇聯崩解後人口喪失了一半³⁴，現在的國民生產毛額大約和巴西相當³⁵。中國大陸雖然快速崛起，但是起步太遲，和美國相比還有一大段距離。在蘇聯崩解、冷戰結束的這十年當中，美國拉大了競爭者間的差距，它的國力足以使其稱霸全球。

在表二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就 GDP 而言美國在冷戰結束前的一九八五年佔世界七大強國總和的 36%，到二〇〇〇年此一比例上升到 40%。而就國防支出而言，在一九八五年時，美國的支出是七國總和的 40%，五年後此一比例上升到 55%。如果和二次大戰結束五年後的一九五〇年做比較，當時世界各國由於被戰火荼毒，才剛開始恢復，而美國則國力鼎盛，處於前所未有的高峯期。當時美國 GDP 佔主要國家總和的份額（約 50%）超越二〇〇〇年，但是在國防支出上二〇〇〇年的美國在七國中的支出份額（55%）則高於一九五〇年的 43%³⁶。因此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國力上取得了極大的優勢，接近或超越了二次大戰剛結束時的情況，可說是美國國力在半個世紀以來的第二個高峰。

³⁰ 例如在南斯拉夫的兩次用兵，一次是解決波士尼亞的爭端，一次是阻止在科索沃的種族清洗。關於美國在後冷戰時期使用武力的情況，參見裘兆琳（2001）。

³¹ 當然許多學者還是批評美國在冷戰結束後仍然維持著帝國的霸權心態，而不能夠從世界各地撤退不再被需要的美軍部隊。也就是冷戰不過是提供了美國建立帝國霸權的理由，因此冷戰結束後美國還是不願意減少它在全球的帝國勢力。參見 Chalmers Johnson (2000: 5)。

³² 美國的此種被動干預國外事務的姿態被 Richard N. Haass 稱為「勉為警長」（reluctant sheriff）。參見 Richard Haass (1998)。

³³ 具體表現就是一九九二年的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以及依其所建立的歐洲聯盟。

³⁴ 從 2 億 8,000 萬減少到 1 億 4,000 萬。

³⁵ 俄羅斯在二〇〇〇年的 GDP / PPP 是 1 兆 1,200 億美金，大約和巴西的 1 兆 1,300 億美金相當。參見 CIA, *The World Fact Book 2001*, 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³⁶ 因為當時日本、德國和中共的國防支出缺乏資料，因此無法計算出具體數字。但是在二次大戰結束五年後，這三個國家的軍備支出必然是極有限的，因此我們仍然可以看出大致的趨向。

表二：美國的國力

GDP (PPP, 美國為 100)							
	美國	英國	俄羅斯*	日本	德國	法國	中共
1950	100	24	35	11	15	15	na
1985	100	17	39	38	21	18	46
2000	100	15	13	35	21	15	52

國防支出 (美國為 100)							
	美國	英國	俄羅斯*	日本	德國	法國	中共
1950	100	16	107	na	na	10	na
1985	100	10	109	5	8	8	10
2000	100	11	20	15	10	12	14

*在一九九二年前為蘇聯數字，一九九二年後為俄羅斯數字。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President at the Creation," June 29th, 2002, p. 8。

在兩個高峰之間（二次大戰後和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國力和信心曾經有過一段時期的中衰。如果以美國 GDP 佔全球 GDP 的比重來看，在一九六〇年美國佔 25.9%，在一九七〇年已經落到 23.0%，在一九八〇年更只有 21.5%（Kennedy, 1989）。然而在冷戰結束後美國國力迅速回升，現在已經重新佔回 31.2%。如果以美國的人口和它在全球的影響力相比，更可以看出這個霸權國力之強與生產力之高。美國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 4.7%，但是在經濟上美國的 GDP 是全球 GDP 的 31.2%，在軍事上美國的國防支出是全球的 36.3%，在科技上美國的研究發展費用是全球的 40.6%，而在文化的影響力上美國製作電影的票房收入是全球的 83.1%³⁷。

強盛的實力與相對內斂的政策，使得美國在九〇年代成爲一個稀有的帝國。批評者或以爲華盛頓頤指氣使、宰制國際，然而和歷史上具有美國當前國力的霸權比較起來，美國的帝國主義是節制的。美國的相對內斂使得華盛頓對許多國家而言較不具威脅性，因而延緩了依據古典現實主義的規律所應出現的反美同盟。在九〇年代，國際間只有北京和莫斯科因爲受到美國霸權的壓力而隱隱然結成準同盟，可是美國的盟友都繼續和華盛頓保持緊密的關係。

然而到了九一一之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受到致命的挑戰，因而激動了布希政府高度動員美國的國力，國際體系的現實權力分配因而變得更爲清晰。美國在蘇聯解體後就有一手重塑世界新秩序的能力，但是它缺乏意志和興趣，因此美國的絕對權力優勢並沒有被展現出來。經過了九〇年代的高速經濟增長和科技突破，美國的實力更爲增強。由於受到賓拉登的致命挑釁，「布希主

³⁷ 參見 The Economist, "President at the Creation," June 29th, 2002, p. 4.

義」適時地動員了美國正處於高峰的國力，因而使得國際體系的實際權力分配表現得非常清楚。最能夠表現出此一現象的便是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在反恐議題上和美國的配合。

北京和莫斯科組成對抗美國的準同盟是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所預期的。由於在後冷戰時期北約持續東擴，使得俄羅斯大感威脅；而中共又在意識形態上和美國對立，並且認為美國是針對中共才計畫在東亞部署戰區飛彈防禦體系，因此強大的美國同時對中共和俄羅斯構成威脅，而促成北京與莫斯科的相互接近。經由一連串的相互國事訪問和密切諮商後，中共與俄羅斯在二〇〇一年的七月簽署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並且對美國欲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表示了共同反對的態度³⁸。俄羅斯並表明支持北京對於台灣的主權，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並強調聯合國在台灣問題中的角色，顯示了不贊成美國干預的立場³⁹。雖然美國對此故示淡然，但對於中共和俄羅斯的重建反美准聯盟仍然深感戒懼（Henriksen, 2002）。然而，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俄羅斯總統普金（Vladimir Putin）立即表明了對美國的支持，並且在全盤對外政策上轉向⁴⁰，瞬間成為華盛頓最堅強的友邦⁴¹。俄羅斯既然已經向美國靠攏，中共也被迫降低了對華府的敵意，仿效俄羅斯的成例，希望從和美國的合作當中，來獲取最大的利益。中共和俄羅斯從爭相對美國的強勢地位表示抗拒，到爭相表示支持美國反恐，並且在各項的外交政策上和美國配合，是感知到此時和美國合作比對抗美國更為有利。由於美國在布希主義之下興全國之力來進行反恐戰爭，因此莫斯科和北京也轉變了他們的戰略思維，願意和美國配合⁴²。這樣的結果，從現實主義權力結構的觀點來看是很容易理解的。

肆、各國對布希主義的反應：也是現實主義

³⁸ 在二〇〇一年七月十六日所簽訂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中，中共和俄羅斯表明「不針對第三國」，但因不滿美國發展國家飛彈防禦系統，中俄宣稱反對修改及破壞現有的反彈道飛彈條約。江澤民與普金在訂約當日還又簽署了中俄元首莫斯科聯合聲明，特別針對美國發展國家飛彈防禦系統表示：反彈道飛彈條約至關重要，是戰略穩定的基石和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的基礎，兩國贊成維護條約的現有形式。

³⁹ 「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第五條規定：「俄羅斯方面確認中俄兩國元首自一九九二年至二千年間所簽訂政治文件中，對台灣問題陳述之原則性立場的不可變更性。俄羅斯方面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羅斯方面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其中「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是北京對於莫斯科提出的新要求，也是第一次有主權國家做此宣示。

⁴⁰ 這些外交政策上的轉變包括接受美國在俄羅斯勢力範圍的中亞部署軍力、降低對於美國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的抗議、和容忍北約的東擴等。參見 Thomas Henriksen (2002)。

⁴¹ 普金是在九一一攻擊事件爆發後，第一位致電布希表達支持的世界領袖。他接下來在外交政策上的親美轉向使得許多俄羅斯的戰略專家與軍事將領大不以為然。參見 Michael McFaul (2001)。

⁴² 當然此一戰略的轉變是以反恐之名達成的。參見 George W. Bush (2002b: ii)。

布希主義轉動了美國的戰略軸線，雖然仍然是以現實主義追求國家安全利益，但是對手已經從傳統的敵對大國轉成現階段有可能透過恐怖主義攻擊美國本土的國家，此類國家訴諸恐怖主義，極有可能是因為在國力與傳統軍力方面和美國差距懸殊，因此採用了以小搏大、超越常規的恐怖主義（Jervis, 2002: 38）。在對手轉變了之後，美國對於各國的態度也相應地發生了轉變，這就提供了各國重新定義和美國關係的機會。當各國重塑和美國關係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現實主義主宰了各國的戰略考慮。各國決策者都試圖在新的機會－約制框架當中極大化本身的安全價值。在若干國家之中，此種國際現實主義被國內政治環境所約束，因為執政者必須在同為現實主義的國際－國內「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當中求取均衡⁴³。在以下的討論當中，我們將區分美國的盟友、美國的潛在對手、和回教國家三部份來加以討論。

美國的盟友在九一一攻擊行動之後，自然會對美國給予同情。許多歐洲國家本身嘗受過恐怖主義的侵襲，對於美國的受難更容易產生同理心。然而促使各國真正支持美國反恐作戰的，主要還是華盛頓的壓力和各國感到必須與美國維持同盟友好關係的考慮。就是在這一點上，反映了美國現實的國力和各國現實的考量。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北約認定對美國的攻擊視為對北約的攻擊，因此北約各國就承擔了參與後續反恐戰爭的責任。對於英國和加拿大等傳統的美國的盟邦而言，軍事承諾是當然之舉。英國為了維持和美國的特殊關係，更踴躍支持反恐戰爭，積極地派遣三軍兵力協同美國赴阿富汗作戰。荷蘭、義大利等國也提供了軍事支援。即便澳洲與紐西蘭等國也以派出特種部隊等方式參與作戰。傳統上和美國較為疏遠的法國同樣遣軍參戰，而德國更是為了積極參與世界事務，為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做準備，因此派出兵力，提供核生化防護與醫療服務，並協助盟國的空中運輸與海上護航。對日本而言，此次阿富汗反恐戰役比較海灣戰爭更具有意義。在海灣戰爭時日本被要求為美國及其盟國的軍事行動支付費用，在所得與所失之間未必有利。而此次日本毋需提供大量金錢資助，卻可以派遣自衛隊軍艦巡航印度洋，提供美軍後方支援，大大延伸了日本軍事活動的範圍。這是二次大戰以來的首舉，因此符合日本的現實安全利益。總體而言，我們看到美國的盟國在九一一後第一階段反恐戰爭當中因為現實主義的考量都參與了美國所領導的軍事行動。

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潛在大國對手只有兩個，就是俄羅斯與中國大陸。這兩個國家對於美國所帶動的全球反恐戰爭並沒有條約義務要加以支持。特別是當美國在歐洲和東亞都採取了前進的態勢，對於俄羅斯和中國大陸的安全利益構成了威脅。因此北京和莫斯科在美國要求伸張勢力進入中亞，也就是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後院之時，實無合作的必要。然而在美國興舉國之力，進行反恐戰爭之際，明顯表示不合作的態度，必然會招致美方的強大壓力，而更進一步地惡化和美國之間的關係。

⁴³ 關於「雙層賽局」的概念，參見 Robert D. Putman (1988: 427:60)。

在中華和俄羅斯二者中，俄羅斯尤其虛弱。由於在蘇聯崩解後失去了一半的人口，又經歷了葉爾欽執政十年中顛簸的政治和經濟轉型，俄羅斯國力大耗，早就不能夠和美國爭衡⁴⁴。然而由於西方吝於提供經濟援助、插手中亞的石油資源、不斷抨擊俄軍在車臣的軍事行動、不尊重俄國在巴爾幹的傳統利益和地位、又不斷進行北約東擴，讓莫斯科深受威脅，因此從一九九三年開始，俄羅斯就積極向北京靠攏，以尋找抗衡西方的奧援。然而，如果西方能夠給俄羅斯提供更好的交換條件，俄羅斯的領導者是極願意接近西方的。九一一的攻擊事件就正巧提供了俄羅斯轉變其外交方向的時機。由於美國亟需俄羅斯等大國的支持，以在阿富汗進行反恐戰爭，因此給予了莫斯科更多的談判空間。為了緊緊抓住此一難得的時機，俄國總統普金不惜開罪北京，並壓倒國內的反對聲音，迫切地向華盛頓輸誠，結果帶來了美俄間從冷戰結束以來最好的相互關係。

相較於俄羅斯，中國大陸具有更多的抗衡力量。自從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增長，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年平均成長率是 9.75%，在一九九〇年代也有 9.71%。由於中國大陸廣土民眾、資源豐富，人口是美國的 4.6 倍，因此從 GDP 來看，大陸的經濟力量已經達到美國的 52%，這已經超越了蘇聯在冷戰時期最高記錄的 39%（一九八五年）。也就是說，就經濟對比而言，中國大陸對於美國的挑戰超越了冷戰時期的蘇聯。美國在一九八〇年代中也深深憂慮日本的經濟挑戰，當時日本的 GDP 是美國的 38%（參見表二）。因此現在中國大陸對美國的挑戰也超過了一九八〇年代的日本。就總體力量而言，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建立的全球霸權現正受到中國大陸史無前例的挑戰（參見表三）。站在這樣的國力對比的基礎上，北京自然要求獲得強國地位的尊重，而在柯林頓政府時期，雖然美中關係起起伏伏，但是美國始終以平等交往作為對華政策的基調，相當程度上滿足了中國大陸作為新興強國的心理需求⁴⁵。然而在布希政府剛接任之時，便發生了兩國軍機碰撞事件（二〇〇一年四月一日）。當時中共方面以美國迫降軍機機組員作為人質、以換取美方道歉的姿態，深深刺激了布希政府⁴⁶。其後雙方的互動，便充滿了相互較勁的意味。對於美國的國防部門而言，這次的軍機碰撞事件和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之間為了美方偵查機的活動而產生的衝突如出一轍，完全是敵國間蒐集情報的前哨戰。中國大陸因而更確定地成為了美國的假想敵，「中國威脅論」似

⁴⁴ 關於俄羅斯在葉爾欽時期顛簸的政治和經濟轉型，參見吳玉山（2000）。

⁴⁵ 對於崛起的中國大陸，柯林頓政府的謀士們普遍認為平等交往是最佳的政策選項。參見 Ezra F. Vogel（1997）。

⁴⁶ 美國駐北京大使普理赫（Joseph W. Prueher）在四月十一日向中共外長唐家璇遞送了一封正式信函，表明對於中方戰鬥機飛行員王偉的喪生和美方偵查機在未經許可的情形之下降落中國大陸的機場表示“very sorry”，而中共方面便將此譯為「我們對飛行員王偉的失蹤和那架飛機的墜毀深表歉意」，並對美方飛機「未經口頭許可而進入中國領空並降落深表歉意」。由於認為美方已有道歉，因此中共方面便於四月十二日釋放美方的 24 名機組員。而當這些機組員抵達夏威夷後，布希便改採強硬態度，將撞機的責任歸於中方。

乎也找到了確實的證明⁴⁷。

表三：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

	年			份	
	1950's [∨]	1960's	1970's	1980's	1990's
Per capita GDP (元)	174	216	325	853	4,200
Per capita GDP 增長率 (%)	7.73	1.05	5.32	8.18	8.48
GDP 增長率 (%)	10.20	3.01	7.44	9.75	9.71

[∨]自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九。

資料來源：計算自《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年鑑出版社，2001），頁 49、51。

對於中共而言，雖然一再倡言「中國崛起」，但是對於現階段便和美國直接衝突，實在沒有足夠的準備。九一一便適時地提供了化解兩國之間衝突的契機。由於伊斯蘭激進主義者對美國發動了致命的攻擊，一時間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敵人，因此「中國威脅論」就只有暫時偃旗息鼓。原先美國已經將國力快速興起的中國大陸作為假想敵，時時籌謀著一旦雙方產生激烈衝突時，美國及其盟國將如何反應。這種存在於決策者心中的國際關係意象，隱隱然將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設定在相互碰撞的軌道之上。九一一提示了美國最大的安全威脅是來自不同的方向，因而移轉了美國（和西方）的防衛態勢，改變了世界的結盟形態，也就是使世界各國從傳統的國際政治以國家利益為主軸所衍生的相互關係轉變到以對抗國際恐怖主義、或對抗「反西方、反現代化的伊斯蘭基本教派」為主軸的相互關係上來。質言之，中國大陸可能在九一一之後從美國頭號假想敵的角色解放出來，而讓位給賓拉登與國際恐怖主義者。此種後九一一的態勢，加上美國在反恐戰爭中勢必需要中國大陸的支持，使得北京可以趁機改善和美國的關係（Goldstein, 2001）。特別是當中國大陸唯一可以倚托的俄羅斯在九一一後迅速採取外交轉向之際，和美國改善關係更是刻不容緩。於是現實主義的計算驅使著北京也加入反恐陣營當中。

既然是現實主義和安全考量促使著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加入國際反恐陣營，並改善和美國的關係，這兩個國家必然會力求在反恐行動中極大化本身的利益。對於俄羅斯的領導人而言，九一一的恐怖份子攻擊行動讓他們回想起一九九九年莫斯科的一系列大規模恐怖爆炸事件。這些在公寓和地鐵的爆炸案促使當時的總理普金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並幫助他贏得了二〇〇〇年的總統大選⁴⁸。此後由於俄軍在車臣

⁴⁷ 「中國衝突論」的典型之作如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1997) 與 Bill Gertz (2000)。

⁴⁸ 在一九九九年八月，車臣分離主義者攻擊了俄羅斯的達格斯坦（Dagestan），接著在莫斯科的公

並不能夠完全控制局面，經常受到伏擊並遭受大規模的損失，因此採取了相當殘酷的鎮壓措施。西方國家對於俄羅斯在車臣的軍事行動就批評不斷，而俄羅斯則認為對於分離主義的恐怖份子絕不可以心慈手軟。迨九一一發生之後，普金一方面對於美國的反恐運動表示支持，一方面則將蓋達組織和車臣的反抗運動聯繫起來，表示車臣的分離主義也是恐怖主義。由於車臣游擊隊不僅攻擊軍事目標⁴⁹，更深入莫斯科大規模地綁架人質⁵⁰，因此使得莫斯科的指控更有根據。車臣游擊隊的恐怖主義，加上美國需要俄羅斯支持其反恐戰爭，因此對於莫斯科鎮壓車臣的行動也降低了批評。在二〇〇二年九一一攻擊行動一週年時，美國正進行各種紀念活動，而俄國則在同時對喬治亞境內的車臣游擊隊進行大規模的攻擊⁵¹。在中國大陸的方面，則將新疆（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和國際恐怖主義掛鉤，使得美國同意將疆獨（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列名於國際恐怖主義的名單之上⁵²。不論是車臣或東突的分離主義，都具有非常強烈的伊斯蘭色彩，並因此獲得相當多民眾的支持。這兩個運動在過去曾經進行過對俄羅斯和中國大陸重要城市的攻擊活動，因此莫斯科與北京將車臣和東突與賓拉登等同看待，毋寧是很自然的。然而車臣與東突的基本訴求是政治獨立，這又和賓拉登重建中世紀回教國度的理念有很大的差異。美國在反恐戰爭中，爲了獲得莫斯科和北京的支援，因而相當程度

寓區和地鐵又驚傳一連串大規模的恐怖爆炸事件，造成了 300 人的死亡。俄羅斯政府迅速將莫斯科爆炸攻擊事件歸於車臣叛軍，但是始終沒有明確的證據。關於車臣戰爭，以及和美阿戰爭的比較，參見曾祥穎，「車臣戰爭與美阿戰爭之比較」，載於蘇進強（2002）。

⁴⁹ 例如在二〇〇二年八月十九日，車臣游擊隊便擊落一架滿載士兵的俄軍 Mi-26 直昇機，造成 121 人的死亡。這表示在第二次車臣戰爭發動三年之後，俄軍對於車臣的控制反而越來越弱。參見 Gregory Feifer (2002)。

⁵⁰ 例如在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約 50 多名車臣游擊隊潛入莫斯科的一間音樂廳，綁架了約 800 名人質，要求俄軍撤出車臣，造成全俄極大的恐慌。三天後，俄國特種部隊先行施放了麻醉性氣體，而後衝入音樂廳，格斃了多名腰纏炸藥的車臣恐怖份子，並救出人質。但是由於先前施放的毒氣具致命性，因此造成了 117 名人質的死亡（另有 2 名死於槍戰）。與此同時，俄軍對車臣游擊隊更進行了猛烈的攻擊行動。參見 Nick Paton Walsh and Jonathan Steele (2002) 與 “Russia Names Siege Gas,” *CNN /World*, October 30, 2002, www.cnn.com/2002/WORLD/europe/10/30/moscow.gas/index.html。

⁵¹ 俄羅斯認為喬治亞窩藏車臣分離主義份子，特別是在潘克西峽谷（Pankisi gorge）一帶，使得車臣分離主義者可以對俄軍發動攻擊。喬治亞雖然否認此項指控，但實際上卻依賴車臣武裝勢力來幫助提比里西（Tbilisi）的謝瓦那澤（Eduard Shevardnadze）政府對抗喬治亞本國在阿布哈吉亞（Abkhazia）的分離主義運動。由於俄軍在車臣遭到持續性的反抗，並且不斷承受重大的損失，因此便以喬治亞爲目標，施加極大的壓力，並且將此等動作和美國的全球反恐、特別是準備向伊拉克開戰相聯繫，表明也是反恐戰爭的一部份。參見 *RFE/RL Caucasus Report*, vol. 5, no. 31, September 23, 2002, www.rferl.org/caucasus-report/2002/9/31-230902.html。

⁵² 此項認定是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L. Armitage）在二〇〇二年八月赴北京訪問時宣布的，很明顯是爲了報償中方對於美國反恐行動的支持。中國新聞網，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七日，202.106.184.141:89/gate/big5/www.chinanews.com.cn/2002-08-27/26/215980.html。

上把車臣和新疆的回教分離主義等同賓拉登的伊斯蘭激進主義，這是出於現實國際政治的考慮，也是莫斯科和北京現實主義的勝利。

在反恐戰爭中以現實主義決定位置的除了美國的盟國和潛在的大國競爭對手外，還有一群左右為難的回教國家。這些國家在傳統上是溫和或親美的。然而由於賓拉登發起伊斯蘭的大轟，取得了宗教的正確性，因此這類的回教國家政治領袖在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時，便左支右絀、上下為難。對他們而言，如果配合美國的反恐戰爭，一方面可以獲得實利，一方面可以免除美國的報復。然而這樣做會侵蝕到本身政權在國內的統治正當性，甚至有被推翻的可能。然而，如果他們順從國內的民意而拒絕和美國合作，那麼可想而知會受到美國的制裁。然而在華盛頓的強大壓力之下，大部分的回教國家還是對於第一階段的反恐戰爭（阿富汗戰爭）採取支持的態度。此種做法自然造成親美政權和國內伊斯蘭團體的緊張對峙局面，例如在巴基斯坦和印尼所產生的情形。回教國家支持美國反恐是基於現實主義國家利益的考量，它們的支持有限也是基於國內政治的現實考量。因此在此類國家的「雙層賽局」當中，現實主義是最主要的考慮因素。

在以下的表四當中，列出了美國的潛在對手和回教國家對於美國主導的阿富汗戰爭的支持程度，以及決定此一支持程度的各種因素。在表中把各種決定因素分為國內意識型態、國內族群因素、國際戰略考慮，和議題聯結。國內意識型態是指站在原則性的立場對於美國在回教世界的阿富汗用兵所採取的態度。這其中主要包含了對於恐怖主義的態度、伊斯蘭意識和維護各國主權三項。如果是反對恐怖主義（可能是由於本身曾經被恐怖主義所攻擊），那麼對於美國的出兵是傾向於支持的，在表四中是用（+）表示。如果有較強的伊斯蘭意識，則對於美國的動兵是傾向於不支持的，在表四中是用（-）表示。而如果憂慮美國的軍事行動會損及各國的主權，從而為美國將來的干涉各國事務起了不好的示範，則傾向於不支持美國的軍事行動（-）。國內族群因素是指由於本國內部有和阿富汗相關聯的族群，因而產生了特定的態度⁵³。這其中主要分為各國的領導階層是憂慮本國的少數民族會和阿富汗的

⁵³ 關於阿富汗複雜的族群與宗教問題，參見 Raja Anwar (1988), Gérard Chaliand (1982), Olivier Roy (1986)。

表四：各國對於美國阿富汗作戰的支持程度與決定因素

國家	國內意識形態	國內族群因素	國際戰略考慮	議題	連結	其他	對美國支持程度
中國大陸	反對恐怖主義 維護各國主權 (+)	憂慮回教維吾爾族 獨立運動 (+) ⁵⁵ 但也憂慮戰爭使得 大批阿富汗難民入 境 (-)	希望藉九一一和美 國改善關係 (+) 反對美國力量深入 中亞 (-) ⁵⁶	交換美國對於鎮壓 東突的支持 (+) 交換美國在兩岸關 係中傾向中國大陸 (+)			言辭支持(支持依據 聯合國決議打擊恐 怖主義)
俄羅斯	反對恐怖主義 (+) 維護各國主權 (-)	憂慮回教各族裔基 本教義派在俄羅斯 南翼(車臣、中亞各 國)的興起 (+) ⁵⁷	希望藉九一一和美 國改善關係 (+) 反對美國力量深入 中亞 (-)	交換美國對於俄羅 斯鎮壓車臣的支持 (+)			提供情報,後勤支援 與直接的軍事行 動,但未必與美軍協 調 ⁵⁸ 與伊朗和印度等支 持北方聯盟
烏茲別克		憂慮「烏茲別克伊斯 蘭運動」的叛變(+) ⁵⁹	贊成部份引入美國 勢力,以平衡莫斯科 (+)	美國的經濟援助 (+)		總統卡里莫夫 (Islam Karimov)面 對回教基本教義勢 進軍阿富汗就是利	行動支持,包括提供 軍事基地(當年蘇聯 進軍阿富汗就是利

⁵⁵ 為此中共已經向中阿邊境增兵十個師。中共一直為了對付疆獨而和中亞各國合作。一九九六年北京主導「上海五國元首會晤」,二〇〇一年六月十五日復成立「上海合作組織」(中共、俄羅斯、塔吉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哈薩克),簽訂「上海公約」,主張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和極端主義」。阿富汗境內的極端組織曾為疆獨提供人員訓練、武器彈藥、協助走私販毒,結果中共武警受到攻擊。

⁵⁶ 反對美國勢力進入,一方面是軍事和政治上的意義(如建立軍事基地,長期駐兵,在中共的後院監視中共的軍事動態等),一方面是擔心美國及其石油公司控制中亞豐富的原油和天然氣儲藏。或謂美國的真正意圖就是藉機進入中亞,控制油源。

⁵⁷ 俄羅斯確定阿富汗支助車臣獨立運動。

⁵⁸ 俄羅斯非常在意美國的軍事行動侵犯到俄國的傳統勢力範圍,因此即有可能採取單方面的軍事行動,如同俄軍在北約進入科索沃時俄軍的舉動。

⁵⁹ 從一九九七年開始,卡里莫夫就強力鎮壓境內的回教勢力,但是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 IMU)反而更增加了實力。IMU在塔吉克和阿富汗擁有軍事基地,並以此發動對於烏茲別克的攻擊。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塔什干一連串的汽車爆炸案以卡里莫夫等為目標,造成16人死亡。二〇〇〇年七月他們綁架了美國和德國的人質。卡里莫夫對拉賀蒙諾夫施加極大壓力,甚至遣軍進入塔吉克以求救平叛

塔吉克		和阿富汗北方聯盟的主導民族同為塔吉克人，和北方聯盟的主要支持者伊朗同為波斯族裔（+）		美國的經濟援助（+）	力的挑戰 總統拉賀蒙諾夫（Imomali Rakhmonov）為塔吉克北方的庫列伯人，向為莫斯科所支持；他也面對從阿富汗傳來的基本教義宗教勢力的挑戰	用這些軍事基地） 行動支持，包括提供軍事基地 ⁶⁰
巴基斯坦	伊斯蘭意識昂揚（-）	巴基斯坦的普什圖（Pashtun）族約有 200 萬人，和阿富汗的普什圖人同族，一向是巴基斯坦向阿富汗伸展勢力的主要中介。塔里班政權領袖在巴基斯坦政府支持成立的神學院（madrasah）接受宗教訓練。（-） ⁶¹		美國停止因巴基斯坦核試而施加的制裁（+） 美國對於慕夏拉夫（President General Pervez Mushraaf）總統的軍事政權加以支持（+）		行動支持，包括對塔里班發佈最後通牒，提供軍事設施，但由於國內反美勢力興起，逐漸弱化到強烈言辭支持在支持美軍行動同時，憂慮北方聯盟與伊朗勢力的擴張

亂。

⁶⁰ 塔吉克在一九九七年由政府 and 回教反抗力量簽訂了一個脆弱的和平協定，並在一九九九年舉行了國會選舉，政府中有三分之一的職位依據協定分給回教反抗力量。但是許多回教野戰司令官拒絕停戰協定，並很可能和烏茲別克的回教運動有聯繫，而後者與塔里班政權密切相關。

⁶¹ 巴基斯坦的情報組織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ISI) 支持塔里班奪權成功，此輩人多為 Wahaabism 的忠實信徒，並支持賓拉登。在塔里班和原阿富汗政府的征戰當中，賓拉登所領導的阿拉伯兵團成為克敵致勝的最大利器，同時又促使神學士政權採取更為激進的政策，包括毀滅巴米揚（Bamiyan）的佛像。ISI 又利用 bin Laden 在阿富汗訓練反印度的克什米爾分離運動份子。

印度					美國停止因印度核試而施加的制裁 (+); 美國承諾反對查摩喀什米爾境內的分離運動游擊組織 (+)			行動支持, 包括提供美軍加油基地及後勤援助和伊朗一樣, 支持北方聯盟 ⁶²
伊朗	激進之伊斯蘭意識 (+); 維護各國主權 (-)	批阿富汗難民入境 (-) 反對查摩喀什米爾境內的分離運動恐怖主義 (+)	反對美國力量深入中亞 (-)	伊朗內部素有保守與溫和派之爭, 總統哈塔米 (Mohammad Khatami) 屬於溫和派, 最高宗教領袖何梅內 (Ayatollah Ali Khamenei) 屬保守派, 二人看法不同。哈塔米不反對和美合作, 何梅內則反對任何美國主導的行動, 認不應該聯合非回教徒對抗回教徒	基本立場反對			

⁶² 印度支持北方聯盟是由於其宿敵巴基斯坦素與北方聯盟不睦, 印度是支持其敵人的敵人。同時塔里班支持查摩喀什米爾境內的分離運動恐怖主義。

沙烏地阿拉伯	篤信基本但保守之遜尼回教 Wahaabism 教派，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伊斯蘭激進主義的教義根源（-）	Masood) 而反對神學士 (+) ⁶³ 但也憂慮戰爭使得大批阿富汗難民入境 (-)	從波灣戰爭開始和美國有密切的戰略合作，並提供軍事基地 (+)			言辭支持(不允許美國利用其領土進行攻擊行動)
土耳其	伊斯蘭意識 (-)		作為北約盟國，有義務配合美軍 (+)			始則言辭與行動支持，而不提供軍隊兵員，但開戰後援引北約條款，履行盟國義務
伊拉克	伊斯蘭意識 (-) 維護各國主權 (-)		正和美國敵對，反對美國伸展力量 (-)			反對，攻擊美國是以恐怖主義打擊恐怖主義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⁶³ 伊朗支持北方聯盟，主要是因為在聯盟當中塔吉克人（操波斯語）佔主導地位。在聖戰士（Mujahideen）諸軍當中，伊朗扶植和本身種族相近、或信仰相近的力量。

塔里班政權相合作，以壯大本國的回教分離主義，還是希望藉由本國少數民族和塔里班的關係，以伸展本國在阿富汗的影響力。前者對美國在阿富汗用兵會表示支持（+），後者則會表示反對（-）。國際戰略考慮主要是指對本國與美國關係的著重程度，以及對美國的勢力深入阿富汗所造成戰略後果的態度。如果看重對美關係，則會傾向於支持美軍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如果憂慮美國勢力進入中亞，則會傾向於反對（-）。最後議題聯結方面，如果各國可以藉著支持美國而交換到實質的利益，則會支持美國的出兵（+）。從表四來看，除了被美國視為流氓國家的伊拉克和伊朗之外⁵⁴，不論本國意識型態如何或國內族群因素如何，都因為美國施加的巨大國際壓力，和希望利用議題聯結和美國交換利益，因而對阿富汗反恐戰爭採取合作支持的態度。從此一事實上，我們看到美國施展霸權的成功。

美國用布希主義重建霸主的地位並不是只有造成美國權力地位的擴張而已。由於完全以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和現實主義掛帥，因此布希主義缺乏一個理想主義的遠景，這使得它對於盟國和潛在對手的壓力變得更難讓人接受（Hirsh, 2002）。雖然一時之間美國以強大的國力和受到恐怖主義重大侵害的事實獲取了大多數國家的支持，然而當美國更進一步深化它現實主義的戰略圖謀，例如將反恐戰爭的目標從阿富汗轉移到伊拉克的時候，國際社會的抗拒力量就大大地增強了起來（Tucker, 2002）。由於美國當前的霸主地位，它藉著反恐來實行戰略上的擴張是很有可能成功，然而美國和盟國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和潛在對手國之間的關係，從長期來看都會被強勢的布希主義所影響，而向產生矛盾的方向發展。

伍、仍是現實主義的傳統

現實主義一直是國際關係研究當中的優勢典範（predominant paradigm）⁵⁵。雖然受到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的批判，現實主義對於國際關係始終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九一一攻擊事件對於現實主義是一個重大的挑戰。反現代激進主義非國家行為者的特性、對於宗教價值的追求、和跨越國家界線的思考與行動方式，再再質疑現實主義的國家中心預設。然而要理解九一一對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衝擊不能只看到恐怖主義攻擊的根源，而必須看到國際體系對於此種攻擊的反應。如果體系的反應是依循其過去的運作規律，則九一一可以被視為一種外生的刺激。如果國際體系發生了結構性的改變，那麼九一一就造成了體系的轉型。

⁵⁴ 美國認定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北韓、蘇丹以及敘利亞等七國是支持恐怖主義的流氓國家（rogue states）。其中的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北韓還是「邪惡軸心」。關於流氓國家，參見 George W. Bush (2002c)。

⁵⁵ 關於典範的觀念，參見 Thomas S. Kuhn (1996: 1-9)，關於典範在社會科學的適用，參見 Gary Gutting (1980: 1-21)。

在本文當中分析了九一一恐怖攻擊行動的根源在於反現代化的伊斯蘭激進主義，因此這個事件基本上是一場文明衝突。然而當我們觀察國際體系對於九一一的反應之時，發現不論是美國的布希主義，或是各國對於布希主義的反應，都是依循著現實主義的路徑。就布希主義的戰略思維而言，是從對恐怖主義的戰爭手段宣戰，伸展到對傷害或可能傷害美國國土的國家宣戰。也就是布希主義是以國家作為主要的行為者，主張以美國的國家力量來對抗敵對國家的力量，這是符合現實主義的國家中心前提的。以布希主義的操作方式而言，是以美國的巨大國力為基礎，採行單邊主義、兩分邏輯與先制攻擊，這也是現實主義下霸權運作的典型方式。最後就布希主義的影響成果而言，最重要的是促使在九〇年代還隱然相結以對抗美國的俄羅斯與中共轉變其戰略思考，而在反恐戰爭中和美國連成一氣。因此從布希主義的戰略思惟、操作方式和影響成果而言，都是反映出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特質。就各國對布希主義的反應而言，也是依循著現實主義的路線。由於美國在九〇年代國力增長快速，達到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的第二個高峰，而布希主義的提出又一改柯林頓時期較為內斂的對外政策，主動積極地重塑國際環境，因此不論是美國的盟邦、潛在的競爭對手、或是身處國內外外交壓壓力之下的回教國家，都在阿富汗戰役中與美國配合。當然在美國將戰爭目標轉移到伊拉克的時候，各國的反抗較大，然而美國仍舊能夠運用其優勢的國家力量，逐漸轉變各國的態度。綜合言之，九一一的攻擊行動是非現實主義的，然而國際體系對於九一一的反應卻是標準的現實主義的。由於國際關係並沒有發生結構性的轉變，也就是國家還是主要的行為者、國家安全還是最主要的考慮因素、世界還是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的狀態而各國必須自我防衛、同時在此種情況下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和戰爭仍然沒有辦法避免，因此我們可以斷言，九一一後的世界還是現實主義獨領風騷。

然而在現實主義的典範之下，是不是對於國家安全的威脅有了新的界定呢？以往美國所防備的是土廣民眾的大國和軍事強權，因此中國大陸便成為美國的假想敵。現在美國受到由阿富汗神學士政權所支持的伊斯蘭激進主義的致命攻擊，威脅的主要來源顯然轉變了。阿富汗是極端貧窮的國家，其 GDP / PPP 只有 800 美金，還處於部族社會，又飽受戰火摧殘，始終是軍閥割據、族群對立。這樣的國家，會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是完全違反傳統現實主義對於國力和威脅關係的論述的。國家發展程度、軍事力量和威脅程度之間的比例顯然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在此種情況下，由於反恐凌駕一切，吾人必須觀察美國和傳統的競爭國家間的關係會有怎樣的變化。

站在現實主義的觀點，對美國新威脅的出現不會取代舊威脅，而只是代表處理的優先順序有所改變。新威脅是較為弱小、採用非傳統戰略，但是在短期就會危急美國利益的國家⁵⁶。舊威脅則是將來可以和美國分庭抗禮的大國，擁有戰略性武力，

⁵⁶ 此即布希所謂 "America is now threatened less by conquering states than by failing ones. We are

但是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威脅可能是中、長期的。因為新威脅的急迫性，因此必須先處理。然而舊威脅的份量更重，所以雖然短期不會強調，但是並不會被忘懷。九一一的意義，是代表美國本土安全感的破滅，因而大大增加了美國人民和菁英的威脅感。此種被驚醒的威脅感不只針對新威脅，也針對舊威脅。因此雖然美國是對恐怖主義宣戰，但是國防預算大幅增加，飛彈防禦系統也如火如荼地計畫研發。美國民眾的愛國心高度昂揚，軍方和國防部的發言地位迅速上升，政府中鷹派取得優勢，布希主義單邊途徑和非友即敵的兩分邏輯高唱入雲，「帝國」被給予正面的意義，凡此種種不僅是對新威脅的反應，更是對舊威脅的前進防禦。就好像在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是對所有的敵國宣戰，而不僅是針對發動偷襲的日本。九一一攻擊事件使得美國產生了戰爭心態，因此對於所有的安全威脅都高度地警戒起來。這樣說來，九一一並沒有化解北京和華盛頓間的潛在緊張關係，反而由於挑起了美國的戰爭心態和帝國情懷，因此更增大了將來東西兩強之間劇烈摩擦的可能。

布希主義的現實主義內涵，它的單邊途徑、兩分邏輯和先制手段，一方面對所有的國家都帶來了極大的壓力，迫使各國表態支持；一方面也製造了許多矛盾，埋下了未來衝突的種子。以反恐戰爭由阿富汗階段進入伊拉克階段為例，由於在其中美國追求現實主義利益的痕跡相當清晰，將九一一和伊拉克做議題聯結的武斷性也相當強，因此在各國都激起不同程度的反對。面對這些反對，美國仍然是施展其超強的國力，以「棍棒與胡蘿蔔」的方式驅使各國進入其所領導的「反恐同盟」中來。二十一世紀初的美國霸權，展現出更類似歷史上帝國霸權的風貌，而和二十世紀上半期的內縮孤立與二十世紀下半期為世界提供公共財有所不同。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這是回到了歷史的常規，也和現實主義的核心假設更為貼近。現實主義理論的國家中心前提和安全首要假設之所以顛撲不破，是因為它是歸納自數百年的人類歷史經驗。如果民族國家真正消亡了，那麼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自然無法存續（Ohmae, 1995）。然而只要國家仍然各自擁有武力，安全困境仍然存續，那麼對於國際關係的真實寫照，就只能依循著現實主義的格式。九一一不但沒有改變國際關係中現實主義的基本格局，反而更凸顯了現實主義在後冷戰時期的存續。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中國統計年鑑》，2001，北京：中國統計年鑑出版社。

menaced less by fleets and armies than by catastrophic technologies in the hands of the embittered few.” 參見 George W. Bush (2002c)。

- 吳玉山，2000，〈俄羅斯轉型 1992~1999：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臺北：五南。
- 周煦，2001，〈美國府會軍事權力的爭辯：以布希政府出兵波斯灣為例〉，裘兆琳（編），《後冷戰時期美國海外出兵案例研究》，頁 107-113，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曾祥穎，2002，〈車臣戰爭與美阿戰爭之比較〉，蘇進強（編），《911 事件後全球戰略評估》，臺北：台灣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
- 裘兆琳（編），2001，〈後冷戰時期美國海外出兵案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趙國材，2001，〈論美國出兵海外之法律依據與實踐〉，裘兆琳（編），《後冷戰時期美國海外出兵案例研究》，頁 1-98，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民國 90 年）。

二、英文部分

- Anwar, Raja. 1988. *The Tragedy of Afghanistan*. New York: Verso.
- Baldwin, David A. (Ed.).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ernstein, Richard and Ross H. Munro. 1997.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Bush, George W. 2001. Strengthening Alliances to Defeat Global Terrorism and Work to Prevent Attacks Against Us and Our Friends. Presidential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National Cathedral, Washington D.C.
- Bush, George W. 2002a. Bush Speech to the United Nations. *Washington Post: On Politics*,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7587-2002Sep12.html.
- Bush, George W. 2002b.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ational Strategy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Congress, 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 Bush, George W. 2002c. Prevent Our Enemies from Threatening Us, Our Allies, and Our Friends with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Presidential speech delivered at West Point, New York, www.whitehouse.gov/nsc/nss5.html.
- Chaliand, Gérard. 1982. *Report from Afghanista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CIA, *The World Fact Book 2001*, 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 Feifer, Gregory. 2002. Chechnya: War Enters Fourth Year with No End in Sight (Part I). *RFE/RL*, September 24, www.rferl.org/nca/features/2002/09/24092002152454.asp.

- Fonte, John. 2002. The Ideological War Within the West. *FPRI Watch on the West*, 3, 6, www.fpri.org/ww/0306.200205.fonte.ideologicalwarwithinthewest.html.
-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 Garfinkle, Adam. 2001. September 11: Before and After. *FPRI Wire*, 9, 8, www.fpri.org/fpriwire/0908.200110.garfinkle.sept11.html.
-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ertz, Bill. 2000.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 Goldstein, Avery. 2001. September 11, the Shanghai Summit, and the Shift in U.S. China Policy. *FPRI E-Notes*, www.fpri.org/enotes/americanwar.20011109.goldstein.sept11china.html.
- Gutting, Gary (Ed.). 1980. *Paradigms and Revolutions*.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University.
- Haass, Richard. 1998. *The Reluctant Sherif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 Hay, William Anthony. 2001. America, the West, and the World. *FPRI Watch on the West*, 2, 5, www.fpri.org/ww/0205.200109.hay.americawestworld.html
- Henriksen, Thomas. 2002. American Interests and Geopolitical Realignment. *Hoover Institution Weekly Essays*, www-hoover.stanford.edu/pubaffairs/we/2002/henriksen_0802.html.
- Hirsh, Michael. 2002. Bush and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81, 5, www.foreignaffairs.org/articles/hirsh0902.html.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3: 22-49.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Jervis, Robert. 2002. An Interim Assessment of September 11: What Has Changed and What Has No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7, 1: 37-54.
-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Chalmers. 2000.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Henry Holt.
- Kapstein, Ethan B.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1999. *Unipolar Politics:*

-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nnedy, Paul. 1989.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2000. *Power and Independenc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Kessler, David E. Bush Sees 'Urgent Duty' to Pre-empt Attack by Iraq.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www.nytimes.com/2002/10/08/politics/08BUSH.html?todaysh headlines.
- Kessler, Glenn. 2002. Reaffirming A Policy of Preemption.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10680-2002Sep12.html.
- Krasner, Stephen D. (Ed.).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uhn, Thomas S. 1996.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urtz, Stanley. 2002. The Future of History. *Policy Review* (on line), 113, www.policyreview.org/JUN02/kurtz.html
- McFaul, Michael. 2001. Putin's Moment of Truth. *Hoover Institution Weekly Essays*, www-hoover.stanford.edu/pubaffairs/we/current/mcfaul_1001.html.
- Morgenthau, Hans J. 1967.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Mueller, John. 2002. Harbinger or Aberrati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on line), 69 www.nationalinterest.org/issues/69/mueller.html.
- Ohmae, Kenichi. 1995. *The End of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New York: Free Press.
- Putman, Robert D. 1988. Diplomatic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3: 427-60.
- RFE/RL Caucasus Report*
- Roy, Olivier. 1986. *Islam and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cks, Jonathan. 2002. The Dignity of Difference: Avoiding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PRI*

- Wire*, 10, 3, www.fpri.org/fpriwire/1003.200207.sacks.dignityofdifference.html.
- Sanger, David E. 2002. Bush Sees 'Urgent Duty' to Pre-empt Attack by Iraq.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www.nytimes.com/2002/10/08/politics/08BUSH.html?todaysh headlines
- Shultz, George P. 2002. The Work of Diplomacy. *FPRI E-Notes*, www.fpri.org/enotes/diplomacy.20020611.shultz.workofdiplomacy.html.
- Sicherman, Harvey. 2001. Bleak New World. *FPRI E-Notes*, www.fpri.org/enotes/ americawar.20010913.sicherman.bleak.html
- Singer, P. W. 2002. Time for the Hard Choices: The Dilemma Facing U.S. Policy Towards the Islamic World. 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S. Policy Towards the Islamic World Working Paper: 1.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Tucker, Robert W. 2002. The End of a Contradicti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on line), 69, www.nationalinterest.org/issues/69/symposium.html.
- Vogel, Erza F. 1979.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ogel, Ezra F. (Ed.). 1997.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W.W. Norton.
- Walsh, Nick Paton and Jonathan Steele. 2002. Putin's New Human Mask Slips in Trial of Strength. *Russia Today*, October 28, www.einnews.com/russia/frames/ frames.php3?webnewsid=4640295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Wendt, Alexander.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2: 391-425.
-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u, Yu-Shan. 2000. China in a Small World: Challenge, Demonstration, and Dependence. In Jeffrey Kopstein, Mark Lichbach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ests, Ident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pp. 229-26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ill the Realist Tradition: September 11 and the Bush Doctrine

Yu-shan Wu*

Abstract

The September 11 incident has an enormou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oliberalism had mounted attack on realism, the hitherto dominant paradigm in the field.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onstructivism joined the assault on realism. The September 11 incident apparently shows the validity of Samuel P. Huntington'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orem. Can realism survive this whole series of assault in the post-Cold War, post-September 11 world? This is the main concern of the article in which we explore the root of the September 11 attack, the impact on realism, and the way international system responds to the shock. We find the September 11 attack was motivated by Islamic anti-modernization radicalism, which testifies the validity of Huntington'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aradigm. However, the respons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hether the Bush Doctrine with its strategy, operation mode, and impact, or the response to the Bush Doctrine by the world countries, clearly follows realist postulates. Hence the validity of realism as an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vindicated by the September 11 incident and its impact.

Key words: September 11, Bush Doctrine, realism, clash of civilizations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